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2年卷）编委会

顾　问：韩兆琦　张大可　张新科

主　任：丁德科

副主任：凌朝栋　党大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德科　马雅琴　王晓红　韦爱萍　杜振虎

张　晶　赵怀忠　党大恩　党艺峰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雷炳锋　詹歆睿　蔡静波

主　编：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2年卷 / 丁德科，凌朝栋，党大恩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ISBN 978－7－100－11260－4

Ⅰ．①司… Ⅱ．①丁… ②凌… ③党… Ⅲ．①司马迁（约前145或前135～?）－人物研究②《史记》－研究－2012－年鉴 Ⅳ．①K2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417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
2012年卷

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260－4

2015年5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16
2015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3/4

定价：45.00元

渭南师范学院中国司马迁与《史记》研究院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年鉴》（2012年卷）编委会

顾　问：韩兆琦　张大可　张新科

主　任：丁德科

副主任：凌朝栋　党大恩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德科　马雅琴　雷炳锋　王晓红　韦爱萍

杜振虎　张　晶　赵怀忠　党大恩　党艺峰

党旺旺　凌朝栋　梁建邦　詹歆睿　蔡静波

主　编：丁德科　凌朝栋　党大恩



目录

学术前沿

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述略 …… 吴原元（3）

《史记》的文本研究 …… （4）

《史记》的文学研究 …… （6）

《史记》的史学研究 …… （10）

《史记》的哲学研究 …… （15）

研究综述

2012年司马迁研究综述 …… 党艺峰　党大恩（23）

司马迁生平及其与时代关系研究 …… （23）

司马迁史学思想研究 …… （25）

司马迁政治思想与价值观研究 …… （27）

司马迁文学美学思想研究 …… （31）

司马迁学术思想渊源研究 …… （35）

司马迁民族、经济思想及其他 …… （37）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012年《史记》研究综述 …… 梁建邦 张 晶（39）
吴越文化研究 ……（39）
思想内容研究 ……（41）
人物研究 ……（44）
体裁体例研究 ……（51）
版本及校勘研究 ……（52）
写作艺术研究 ……（54）
语法文字研究 ……（56）
史记学研究 ……（57）

考古发现与研究

2012年有关《史记》的考古发现 …… 杜振虎（65）
良渚文化考古新发现 ……（65）
商周考古新发现 ……（66）
东周考古新发现 ……（70）
秦汉考古新发现 ……（73）
2012年《史记》考古发现研究 …… 杜振虎（78）
三皇五帝时代考古研究 ……（78）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 ……（80）
夏代文化考古研究 ……（84）
商代文化考古研究 ……（84）
西周考古研究 ……（88）
东周列国考古研究 ……（95）
秦汉考古研究 ……（111）

版本整理与研究

版本与校勘研究 …… 王晓红（123）
版本研究 ……（123）
校勘研究 ……（125）

词语考证与语法研究 …… 韦爱萍（130）
国家图书馆所藏《史记》部分选本目录 …… 凌朝栋（137）

著作简介与论文摘要

重要研究著作与论文集简介（2012） …… 赵怀忠（143）
重要论文摘要（2012） …… 马雅琴（157）

海外研究

日本《史记研究书目解题》中的选本记录 …… 凌朝栋（181）

论文著作索引

司马迁研究论文目录（2012） …… 詹歆睿（197）
《史记》研究论文目录（2012） …… 詹歆睿（201）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著作目录（2012） …… 赵怀忠（213）

研究动态

吴越文化与《史记》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史记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
在杭州召开…… 韦爱萍（223）

后 记 ……（225）

约稿启事 ……（226）



学术前沿

百年来美国学者的《史记》研究述略※

作为中国传统史学和中国叙述学典范的《史记》，自19世纪开始吸引美国学者的关注。早在1840年，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就在其创办并主编的综合性英文月刊《中国丛报》上刊载了柯立芝夫人（Mrs Coolidge）英译的法国汉学家雷慕沙（Albe Remusat）关于司马迁父子及其《史记》的研究文章①。20世纪30年代，卜德（Derk Bodde）在对《史记》卷八十七《李斯传》及卷八十三《鲁仲连邹阳列传》、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进行译注的基础上撰著了《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从李斯的一生研究秦朝》和《古代中国的政治家、爱国者及将军：〈史记〉秦朝人物传记三篇》这两部著作②。自此以后，关于《史记》的研究著述蔚为可观，已然发展成美国汉学界的经典研究领域。本文拟对100多年来《史记》在美国的研究概况作一梳理。限于学识和笔者的眼界，难免有疏漏和舛误之处，恳望学界同仁见谅和指正。

※ 此文原载于《史学集刊》2012年第4期。作者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史学博士。

① Biographical Notices of Szema Tan,and His son Szema Tseen.“Chinese Historians”, Translated for the Repository From the French of Remusat. *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LX.No.4(August, 1840),pp.210-219.

② See Derk Bodde. *China's First Unifier:A Study of the Ch'in Dynasty as Seen in the Life of Li Ssu*. Leiden:E.J.Brill, 1938; Derk Bodde. *Statesman, Patriot, and General in Ancient China: Three Shih-chi Biographies of Ch'in Dynasty, 255-206 B. C.*, New Haven,Con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40.

《史记》的文本研究

《史记》的文本问题，尤其是《史记》与《汉书》间的关系，在西方汉学界一直以来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曾发表了《司马迁语言拾零》一文，认为司马迁并没有严格按照“他从先秦文本中所学到的文学语言形式”，但他可能受到他所处的汉代地方口头语言之影响。[①] 自高本汉论文后，关于《史记》文本研究的成果相继产生。吴德明（Yves Hervouet）通过研究发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和《史记》的《司马相如列传》在文本上有近 800 处存在差异；在他看来，这些存在差异的文本中有近一半是在这两种版本之间无法找到合理解释；但通过考查韵律、查验上下文之间关系、不同字形变化及其他因素，他认为《汉书》的版本“似乎更为理想”；另一方面，他又发现《史记》版本中有近 29％之处要优于《汉书》。因此，吴德明在结论中非常谨慎地承认，问题可能源自于公元 1 世纪《汉书》经常被反复抄写，同时这种差异也可能是抄写人员试图根据《汉书》重建《史记》遗失的篇章。[②] 何四维（A. F. P. Hulsewe）在仔细比较了《史记》和《汉书》的词及短语后断定，目前的《史记》卷一百二十三是尝试通过利用《汉书》卷六十一的材料和《汉书》其他卷章资料重建遗失的《大宛传》的结果。对于更仔细研究其他卷章的呼吁，何四维预言其结果是：“我相信进一步的研究也将显示《史记》这本著作中有关汉代其他篇章的不可靠性。”[③] 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为何四维的《中国人在中亚》一书所写的导言中讨论这一问题。在经过考察大量资料、文本考辨及外部取证之后，他认为《史记》文本是衍生物。为支撑其观点，他提供了两个新的间接证据：一是本卷及《史记》卷一百三十在内的简明提要部分丝毫没有提到张骞、李广或大宛战役、俘获汗血马等这一卷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及其重大事件，从这段话中也可明了“一旦汉朝派遣使节去大宛时，地处边远西部的蛮族人便伸长脖子朝内看，希望观看一下中原大地”；二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三文本的前半部分确有张骞传……但是《史

① Bernhard Karlgren.“Sidelights on Si-ma Ts’ien’s Languag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Vol.42(1970),p306.

② See William H. Nienhauser. “A Century (1895-1995) of Shih chi Studies in the West”, *Asian Culture Quarterly* ,Vol.24.No.1 (1996).

③ A. F. P. Hulsewe. “The Problem of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chi 123,the Memoir on Ta Yuan” , *T’oung Pao*.Vol.61(1975),p89.

记》卷一百一十一不仅有张骞的简短生平传记记载，还列举了他和在《史记》其他卷中明确标明没有任何个人传记的将军们。[①] 然而，榎一雄（Enoki Kazuo）的《〈史记大宛传〉与〈汉书张骞李广传〉的关系》一文为反驳何四维的观点提供了间接证据。榎一雄认为《史记》在卷一百二十三中遵循了古老的名称使用方法，不能就此认为是从《汉书》中复制而来；吕宗力（Lü Zongli）的《重新思考〈史记〉卷一百二十三的真实性问题》也显示，尽管何四维和鲁惟一都认为《史记》所记载的公元 100 年至 400 年这部分不可利用，但他们在著作中大量引用并参考有关这 300 年的记载即无法使人相信他们的观点；再者，何四维所引证的作为《史记》源自《汉书》证据的语言学范例总体上完全不具决定性。[②]

自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史记》的文本问题也开始成为美国汉学界的焦点。戴维·B. 哈尼（David B.Honey）的《〈汉书〉、原稿证据及〈史记〉校勘：以匈奴列传为例》一文，通过对《史记》与《汉书》中关于匈奴列传的文本分析，并借助信息传播理论中文本与版本间的差异区分，认为《汉书》中有关匈奴的叙述比《史记》中保存得更为原始；除非语言学证明，否则一般说来在所有相同叙述中汉书应摆在首位。《汉书》总体上优于《史记》的原因在于，虽然《史记》在最初遭受冷落，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受到极大关注，这导致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改换名称以使《史记》在一定程度上免遭污染。《汉书》卷九十四即是作为原始匈奴叙述传播的第二阶段，逃过了众多评论家的注意。由于司马迁的名声，他们所关注的是《史记》中的相关叙述，对《史记》叙述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引入错误，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添补。[③] 马丁·克恩（Martin Kern）的《关于〈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的真实性及意识形态的注释》，认为《史记·乐书》这一卷并非出自司马迁之手，其日期是西汉晚期或东汉初期。《乐书》作为晚近编撰之物，其编撰者的意图在于从祭祀的古典风格这一视角对汉武帝的郊礼歌、壮观典礼及汉武帝行为所做的一种批评，以此获得在西汉最后几十年间的政治和文化统治权。[④] 2003 年，克恩在《美国东方学会学报》上再次发表《司马迁〈史记〉中的司马相如传与赋的问题》一文，进一步阐述其对《史记》文本的怀疑。他基于对《史记》《汉书》及《文选》中司马相如赋不同

① A. F. P. Hulsewe. *China in Central Asia:The Early Stage 125 B.C.-A.D.23*. Leiden:E.J.Brill 1979, pp.12-25.

② Zongli Iü “Problems Concerning the Authenticity of Shih chi 123 Reconsidered”, *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Articles,Reviews*,Vol.17(Dec.,1995),pp.51-68.

③ David B.Honey. “The Han-shu,Manuscript Evidence,and the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Shih-chi:The Case of the Hsiung-nu Lieh-Chuan”,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Vol.21(Dec.,1999),pp.67-97.

④ Martin Kern.“A Note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Ideology of Shih-chi24,The Book on Music”,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19,No.4(Oct.-Dec.,1999),pp.673-677.

版本的语言学比较，以及《司马相如传》本身所存在的诸如这篇传记是《史记》中仅有的几处出现谈资的地方之一、汉武帝发现司马相如才华的故事明显荒谬而稀奇古怪、《司马相如传》富有极端的想象性以及如果司马迁明确将赋这种文学形式作为对间接政治警告和讽刺批评的一种尝试，为什么单单关注司马相如的著作而忽视其他同时代作者和著作等所有可资利用的证据，以表明收入到现在版本《史记》中的这一卷并不是出自汉武帝时期，一定是更晚时期或几个世纪以后，很有可能是基于《汉书》中相类似的人或物。总的说来，相互独立的几组证据不能不让人怀疑《司马相如传》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是一种异常文本。[①] 倪豪士（William H.Nienhauser）则在其领衔的译著《史记·汉本纪》序言中，对“一小撮西方学者尝试证明《史记》有部分遗失，其遗失部分是复制于《汉书》”的观点进行驳斥。通过对《史记》卷八汉《高祖本纪》与《汉书》中相同部分的文本比较分析，他的结论为《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是比《汉书》是更早的文本。[②]

高本汉在 20 世纪发表的一篇小文引发了西方就《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仍没有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无论是更仔细而广泛的语言学研究，还是从比喻、情节、叙述结构等方面搜寻辅助证据似乎都有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更有可能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史记》的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界乃至英语世界第一部详细研究司马迁的著作是华兹生（Burton Watson）的《司马迁：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这部出版于 1958 年的著作，共分司马迁的世界、司马迁传记、中国史学的起源、《史记》的形式以及司马迁的思想等五章。由于华兹生这本著作针对的是汉学家和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故此其著述中存在一些缺陷，“故意选择忽略有关《史记》历史编纂的某些方面，如司马迁所依据的史料、司马迁之后几个世纪中国学者的批判、《史记》的历史文本”[③] 等。但是，华兹生通过他的分析和雄辩动人的英语语言成功地向西方介绍了《史记》的文学风貌。华兹生如是描述司马迁在传记方面的创新：

① Martin Kern. “The Biography of Sima Xiangru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Fu in Sima Qian’s Shiji”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123,No.2(Apr-Jun.,2003),p.307.

② William H.Nienhauser(ed.). *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The Basic Annals of Han China*, 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2,pp. xiii-xlviii.

③ Burton Watson. *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p.x.

在他的传记中，司马迁并没有简单地详述一系列的个人生平，他也不是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通过有密切关联的年代或地理来把握其主题。他深信那些来自他之前时代的经典和哲学著作是深刻的，人类历史事件的过程中潜藏着永恒不变的道德模式。他遵循着便利的年代顺序，但在他看来年代顺序应从属于他认识过去时代人们生活的那些模式。他根据历史人物的生活和激励他们的雄心将其研究对象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无论我们如何想象这些群体的生活，我们必须承认激发司马迁和他的同胞们所致力探寻的基本哲学思维模式已展现出来。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残暴昏君和有德之君、正直大臣和谗谄奸臣的典范在历史上已树立。思想观念的模式和模式本身在司马迁时代已过时。正是司马迁认识到它们不仅适用于远古时代的人们，也同样适用于他所处的时代。于是，他拿出过去那一成不变的陈旧纸板，在上面描绘出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画像。他发现被已往忽视的黑白讽刺描述手法的精妙之处，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人类在历史上所具有的真正价值是由人们生活的基本道德模式所决定的这种观念。当传记成为官僚成员而非个人的创造物时，后来的中国史学著作都漠视这种古老的不管他们的生活经历是否真值得记录或具有价值都为所有最高阶层官员立传的方式。但《史记》的惯例却是，不仅为那些在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重要人物立传，同样也为那些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并在中国文献著作中继续发挥影响的人们立传。司马迁之后不久，出现了一大批像刘向的《列女传》、皇甫谧的《高士传》这类传记著述，这应归功于司马迁的榜样作用。这类传记的对象都是那些投身于群体、生活都显示出相同道德模式的个人。这种源自于《史记》的表和《汉书》的列传的新式类型一直到现在仍然在中国传记写作中占主流。[①]

上述这段话向西方介绍了有关《史记》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长期以来被公认但却不为接受过古典训练的沙畹们所重视的《史记》文本质量问题；二是《史记》对于传记类型发展的影响。华兹生在著作中设想用《史记》所采用的体例描述美国史，“《史记》分为五个部分：本纪十二卷、表十卷、书八卷、世家三十卷、列传七十卷。这种形式完全不同于西方所流行的关于历史形式的概念，因为西方要求对历史进行大量的解释。各种不同部分的重要性和作用取决于整本著作的结构和有效性；我认为对其解释的最佳方式是采用这种形式编纂一部美国史。如果读者能够容忍在美国史与中国史两者之间这种充满幻想的思想观念和明显的差异，我将尝试略述这样一部著作可能会是什么样”[②]。华兹生的著述成功彰显了《史记》的文学性，使《史记》在西方读者中复活。

① Watson, Ssu-ma Ch’ien, pp. 129-130.

② Ibid., pp. 104-107.

但是，美国汉学界真正从文学角度研究《史记》，始于约瑟夫·艾伦（Joseph R. Allen）。他的《〈史记〉叙事结构初探》一文，将罗伯特·司格勒斯（Robert Scholes）和罗伯特·凯洛格（Robert Kellogg）从西方古典文学叙事中所发展出来的方法论运用于中国传统叙事学。在文中，艾伦考察了《史记》在不同部分所运用的一些叙事技巧，并尝试对《史记》卷六十六《伍子胥传》和卷一百九《李广将军传》这两卷进行精细的分析。

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结构，这两则传记明显不同。我们应用托多罗夫（Todorov）关于传说规律和传说价值的观点来讨论这两个情节结构的形式应该是恰当的。根据这一点，在《伍子胥传》中我们着重强调的是其单线性和动词导向，在《李广将军传》中强调的是插入和形容。一个在行动上是一致的，另一个则在主题上是一致的。这两则传记在主要情节结构形式上相互之间并不排斥，应该可以用来分析《史记》中或单独或综合运用的其他叙事方法。司马迁所寻找的方案，就是超越那种单纯按照事件编年史方式写作，这在列传的叙述中尤其多。我们应该可以发现这两种结构形式的规律、价值及表现。伍子胥和李广的性格特点是静止的、无发展变化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变的，几乎是一维空间。伍所刻画的特色主要在于他的复仇，尤其是他复仇的决心；李广所刻画出来的特色在于他的军事才能和勇敢，并掺杂着一定程度的非正统性和傲慢自大。司格勒斯和凯洛格在讨论所刻画的主人公性格特征时更侧重于其中的一面，但如果相对应地应用到这里那将是危险的。另外一项研究中，司格勒斯为所刻画主人公的性格提供了一个举止文雅的“弗莱模型”，这个模型是根据模拟主人公所生活之真实世界的质量而设计出来。再者，尽管对西方评论流派进行归类可能不完全恰当，但这种归类的方法大体上还是有效，特别是由于史诗中的人物如此之多。虚拟的人物模型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处于上端的男主人公在地位上优于众人但不包括环境（在它上面是传奇与神话），处于下端的男主人公则低于上述两者（如喜剧）。当然，李和伍都处于这个模型世界中上层部分。然而，我们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李广的位置非常之高，或许已事实上接近于神话；然而，伍子胥靠近中间位置，与现实更为接近……这两个人无论是在艺术意义还是历史意义都是真实存在的人，但李缺乏生动性，这是他性格特征和情节建构的结果。①

与他的分析相一致，艾伦认为《史记》这部历史名著对中国后世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史记》是由众多独立的叙事所组成，这些叙事在结构上存在相当程度的变化。毫

① Joseph R. Allen.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ji”,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Reviews*,Vol.3(1981),pp.52-53,60-61.

无疑问，所讨论的这两种要比《史记》中所发现的其他叙事手法更具意味和象征性，但正如我们所说它们并非具有非典型性。我们怀疑在被令人尊重的传统所束缚的叙事手法中绝大多数比模拟更具有象征性。情节、性格、观念及意义混杂在一起，从而使我们看到的这两种叙事手法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史记》中表达意义的方式象征着对先前历史经验主义传统的偏离，转向更具传奇小说意义。我们认为，在这两篇传记中所发现的叙事手法不仅可以在《史记》的其他部分找到，而且可以在更富虚构性的中国经典叙事著作中找到。①

李乃萃（Vivian-Lee Nyitray）的《美德的写照：司马迁〈史记〉中四位君子的生平》，是艾伦之后第一部研究《史记》文学性的著作。这篇博士论文主要是采用文学批评方法分析《史记》中描述生活于公元前 3 世纪的战国时代并被同时代人视为封建贵族楷模的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这四位贤士列传所组成。在文中，李乃萃运用源自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理论、英美新叙事学、西摩·查特曼 (Seymour Chatman) 的电影叙事批评以及中国传统美学理论，分析了《史记》文本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结构元素，并描述了读者通过了解人物行动来判断其中所蕴含之道德内容。这篇博士论文的中心是考察信陵君与看门人侯嬴之间引人注目的关系、仁与德之间的区别。通过分析，作者认为榜样必有缺陷，但正是他们的不完美性增加了他们的吸引力，这也解释了《史记》文本具有持久的文学力量。②

《史记》的叙事魅力及其空间而非时间法则是简小斌（Jian Xiaobin）《〈史记〉的空间化》的主题。他的博士论文分为五个部分：导论、作为理解模式的空间化、《史记》的撰著与史学的传统、《史记》的建构与特征以及结论：建立极权体系和塑造一种多重空间化的映象。总体上，简采用的方法是《史记》应被视为中国伟大传统史学的一部分以及“空间”位置比任何特定的编年史著作都重要。在结论部分，他写道，总体上看，《史记》中的所有部分组成了一座宝塔形体系，这个体系具有明确界定且相互关联的层级和区分法则。在所建立的这种体系中，任何空间中存在的裂缝都经过测查，所经历过的时代都被系统化。尽管个人传记中所出现的表和日期使人感受到历史真实性，同时作为年代顺序的一种参考它也是需要的，但是这种不受任何时间影响的框架体系突出表明的是一种

① Joseph R. Allen. “An Introductory Study of Narrative Structure in the Shiji”, *Chinese Literature:Essays, Articles,Reviews*,Vol.3(1981),p.66.

② Vivian-Lee Nyitray. *Mirrors of Virtue Four‘Shih chi’Biographies,* 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199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